

无形的象征：抗战时期首都忠烈祠筹建始末*

鄢海亮

提 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首都忠烈祠的筹划，不仅意在彰显国家褒忠之典，形塑社会民族意识，还极力凸显其“中外观瞻”的国际意义。然而在祠址的选取、勘测与接收过程中，首都忠烈祠却遭遇以关岳崇拜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和地方利益群体的对抗与阻挠，加之受物价上涨和经费不足影响，筹建计划最终流产。不过，作为一种象征，首都忠烈祠的营造却在无形中创造出一种超越籍贯的“共有民族英雄”形象，使国民政府所建构的忠烈符号得以逐层级、多方位扩散，抗战记忆被强化。

关键词：首都忠烈祠 民族精神 抗战记忆

抗战时期民族危机严重，为动员抗战，国共两党各自建构了一套带有纪念和动员意味的祠祀体系。在中共方面，祭祀的载体主要以墓碑和纪念塔为主。1941年中，考虑到参加抗战的革命者，或因公操劳猝死于疾病，或壮烈牺牲于敌机轰炸和效命疆场中，延安边区政府为表达对殉难者的追悼之心，特指令在延安附近觅定地址建立革命公墓，并于每年的七月七日举行公祭。^①受此影响，中共领导的各根据地先后开始纪念性建筑的建设，如晋察冀军区建有狼牙山烈士碑和殉国烈士公墓，以发扬民族气节^②；晋绥边区和苏北根据地分别修建八路军烈士纪念碑、烈士公墓和新四军殉国烈士纪念塔，以鼓舞抗战的信心^③；冀鲁豫边区一度还考虑建设烈士陵园，以慰忠魂。^④而在国民党方面，祭祀主要以忠烈祠为主。国共两党的纪念性建筑在发扬民族精神、动员民众抗战层面均发挥着重要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的忠烈祠是国民政府为纪念抗战殉难官民、发扬忠烈精神和实现抗战动员而建造的神圣空间。在忠烈祠祀的规划中，国民政府力图克服早前革命先烈祠祀体系中的混乱弊端，希借忠烈祠来重构统一而完整的国家忠烈祭祀体系。随着抗战形势变化和忠烈祠祀的实践，国民党人逐渐建构出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多层级祠祀模式：首都→省会（市）→县（市）→镇（乡）四级忠烈祠。作为最高国殇圣域，首都忠烈祠不仅为中外观瞻，而且还担负着统摄各级忠烈祠、传播忠烈符号和塑造国民政府政治合法性的多重重任，其地位不言而喻。

目前学界对忠烈祠的研究，多集中在中央层面的制度设计上，偏于静态^⑤。部分研究探讨了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战时中国社会”（项目编号：19JJD770006）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边区政府建革命公墓》，《解放日报》1941年8月15日，第2版。

② 参见《狼牙山三烈士殒尽跳崖殉国 军区决定纪念办法》，《解放日报》1941年11月16日，第3版；《清漳河畔祭奠英灵 刘伯承师烈士墓清明奠基》，《新华日报》（重庆）1943年4月19日，第2版。

③ 参见《苏北盐阜各界民众举行抗战烈士塔落成典礼追悼新四军三师殉国烈士》，《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1日，第2版；《晋西北简讯》，《解放日报》1944年11月27日，第2版；《独立一旅公祭死难烈士》，《解放日报》1945年4月17日，第2版。

④ 参见《冀鲁豫筹建烈士陵园》，《解放日报》1945年6月2日，第1版。

⑤ 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蔡锦堂：《“国殇圣域”忠烈祠建立的历史沿革》，《国史馆馆刊》2004年第36期；王余辉：《安生慰死：南京国民政府国家忠烈祭祀制度的建立》，《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2期。

入祀忠烈祠的具体条件以及入祀和纪念的大致过程^①；也有文章从比较和功能视角考究忠烈祠与日本靖国神社的异同及战时战后忠烈祠功能的嬗变。^②而对忠烈祠具体筹建过程中的动态则缺乏足够的重视，对忠烈祠各层级间的联系也未进行充分考究。由于首都忠烈祠在国民政府筹建计划中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因此本文在粗略梳理首都忠烈祠的筹划过程时，还着重探究其在衔接地方和国家抗战记忆中所起的作用。

一 魂归何处：首都忠烈祠计划的提出与祠址选取

筹建首都忠烈祠，是国民政府重构国家忠烈祭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③，该计划的提出最初是以“行都忠烈祠”的形式出现的。1940年5月，在行政院召开的第四六七次会议上，针对前敌将士和守土官吏效命疆场的情状，有代表提出仿照古代昭忠表烈的做法，通过采录死事诸人姓名为位以祀在行都建立忠烈祠一所，从而达到弘扬社会元气、塑造民族楷模和彰显国家褒忠之典的目的。^④此案随即获得通过，同时考虑到重庆暂时只作为行都，新的设祠办法尚未颁布而先前所颁忠烈祠设祠办法中又无设立首都忠烈祠一项，会议最后决定建立行都忠烈祠。“行都忠烈祠”一称便成为首都忠烈祠最早的发端。

1940年7月，重庆市政府奉令派员查勘旧有祠址，但碍于遭日军空袭损坏严重以及疏散居民和人工物料均极困难的现状，重庆市当局不得不做出“待时局平定后在原有忠烈祠祠址基础上另行建置”^⑤的决定。筹建行都忠烈祠的计划第一次遭遇搁浅。尔后在1940年9月公布的忠烈祠祀大纲中，“首都忠烈祠”称谓及相关入祀法令虽被明确提出，但“行都忠烈祠”仍被沿用。同年10月，国民政府委员冯玉祥遵照蒋介石指令草拟了忠烈祠实施办法，办法不仅继续使用“行都忠烈祠”的称谓，还要求祠址的选择应以公共地方且位于交通要道的建筑为最宜，整体建筑则要能做到“以壮观瞻”，以达到“郑重叙功表德”和“以资鼓励”之目的。^⑥

次年3月，考虑到重庆已更改为战时首都，其性质与陪都永久存在，内政部再次提出建设首都忠烈祠的建议。在草拟的八项计划纲要中，内政部对祠宇的建筑布局进行了如下规划：

（一）供奉烈士牌位的大殿一间；（二）供奉古代名将神主的后殿一间；（三）烈士遗像陈列室二间；（四）烈士遗物陈列室二间；（五）书报阅览室一间；（六）参观人士休息室一间；（七）门房一间；（八）供保管员役住宿房两间；（九）杂屋若干间；（十）花圃或小型公园一所。（十一）其他必须之房屋亭台及坊碑临时酌量筹建。

① 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蔡锦堂：《忠烈祠“英灵”探析》，《淡江史学》2004年第4期；张世瑛：《国民政府对抗战忠烈事迹的调查与纪念》，《国史馆馆刊》2010年复刊第26期。

② 参见蔡锦堂：《台湾忠烈祠与日本护国神社、靖国神社的比较》，《师大台湾史学报》2010年第3期；姜良芹、朱继光：《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忠烈祠功能之嬗变——以江苏省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1期。

③ 有关国民政府在制度层面规划忠烈祠的详细过程，王余辉在《安生慰死：南京国民政府国家忠烈祭祀制度的建立》（《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2期）中有较翔实的梳理，本文不再赘述。

④ 参见《内政部、教育部、军政部、重庆市政府会商行都建立忠烈祠的有关文书（内有建立行都忠烈祠会议纪录）》，1940年6月8日—1940年9月3日，内政部档案一二（6）—1733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⑤ 《内政部、教育部、军政部、重庆市政府会商行都建立忠烈祠的有关文书（内有建立行都忠烈祠会议纪录）》，1940年6月8日—1940年9月3日。

⑥ 参见《草拟忠烈祠实施办法》，1940年10月1日，冯玉祥：《冯玉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34—635页。

除此之外，纲要还对首都忠烈祠的选址做出了“距离重庆市区不超过二十公里、地处空旷且易避免空袭、原为风景区或名胜地、交通便利及地方治安良好”^①四项基本要求，规划不仅力图使忠烈功德铭记于世，还有感染观众的目的。这与中共修建的纪念性建筑有相似之处，如晋察冀边区修建的抗战烈士塔，规模宏壮，塔前还有一可容纳50000人的广场；除塔高约5丈外，石碑上还刻有抗战烈士的芳名，纪念塔门上则为一高大的雕刻有边区子弟兵雕像的牌楼，当参观者晋谒时，能让人肃然起敬。^②可以看到，得体的布局和适宜的祠址是国共两党纪念性建筑中最为关键的部分。

对于内政部草拟的大纲，虽然行政院以“暂从缓议”予以搁置，但是内政部下属礼俗司并未停止祠址的勘测活动。由于首都忠烈祠为中外观瞻，是其他层级忠烈祠的典范，因而规模自当不容小觑。正如陈仪所指出的，忠烈祠这类建筑物是表现中国“历史人格的伟大”和“寄托国民精神的所在”，其工程的修建应具有相当的规模，以使后人看后能养成“敬慕祖先、爱护国家民族的国民精神”^③。纲要草拟后，礼俗司随即致电重庆市政府，令其就重庆市近郊风景区或迁建区内原有公共寺庙规模宏大者代为选定适当地址一二处，以便后续派员洽商。^④重庆市政府虽组织相关人员勘测，但结果并不理想。1941年6月，勘测人员上报调查结果，称所堪地区极难寻觅公共祠庙，而即使有可用之处，也因被占用机关、军队“势难迁让”^⑤而不得不作罢。

面对选址中的困境，内政部和重庆市政府虽均表无奈之感，但在抗战大势和中外观瞻的国际意义考量下，完成首都忠烈祠的修建和纪念殉难将士，仍成为其不得不完成的迫切任务。1941年7月，在礼俗司的再三催促下，绘堪人员排除万难，终觅得三处地址。各选址优劣对比情形如下：

（一）真武庙，位于重庆南岸。优势：位居郊野，空袭无虞，房屋较宽敞。劣势：距市中心区过远，交通极为不便；修筑与管理上困难多；地处荒僻，游人稀少，不足以资观感。

（二）瓷器口宝轮寺，瓷器口区镇附近。优势：建自唐代，颇具规模。劣势：附近工厂甚多，空袭难策安全；庙中原有神像多，迁移颇成问题；交通方面，虽舟车均可直达，但距离重庆市区过远，往返殊多不便。

（三）关岳庙，重庆市区中心。优势：地点适中，交通便利，修建、管理和公祭均无困难；庙屋内外宽敞，庙宇宏大圣洁，可大量节省修建费；庙属公产，无产权纠纷，无须租赁手续；该庙专祀关岳，与忠烈祠行政极为相近，合并奉祀无障碍；地处通衢，消防设备完善。^⑥

从这份优劣对比的选址报告中不难看出，相较于南京中山陵分离于世俗而凸显神圣空间的特性^⑦，首都忠烈祠择址的标准显然更考虑其现实环境：既注重安全和规模的宏大，又最大程度做到节省，同时还顾及受众性和交通便利性。总体而言，选址和布局既强调能最大程度地发扬忠烈精神、培养民族意识，又考虑足令中外观瞻的国际意义。这在中共建造烈士墓碑中也十分显见。如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牺牲后，中共在选定墓址时，特意将其位列于朝鲜烈士石墓和范筑先、杨裕民两烈士纪念塔中间，中共北方局、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还规定每年7月1—7日为宣传周，

① 《建设首都忠烈祠计划》，1941—1946年，行政院档案014—010602—0037，台北“国史馆”藏。

② 参见《景仰先烈 晋察冀建抗战烈士塔》，《解放日报》1941年8月16日，第2版。

③ 陈仪：《修筑孔庙中山堂忠烈祠的需要》，《闽政月刊》第6卷第3期，1940年5月31日。

④ 参见《建设首都忠烈祠计划》，1942年，内政部档案129—411，台北“国史馆”藏。

⑤ 《建设首都忠烈祠计划》，1942年。

⑥ 《建设首都忠烈祠计划》，1942年。

⑦ 参见陈蕴茜著：《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以塑造其民族英雄形象，激励各届的抗战热情。^①

在综合比较三地后，内政部最终决定将关岳庙改建为首都忠烈祠，以此来宽慰抗战忠魂。至此，首都忠烈祠祠址的选取任务基本完成，余下的工作便是接收。

二 流产的计划：废庙兴祠中的抵制与迁延

关岳庙位于重庆市巴县境内，其性质虽为县属公产，但在内政部和重庆市政府接收前，庙内已分驻有包括道教、学社、军队留守处、政府机关和商团等在内的 11 个群体，鱼龙混杂。各群体均以关岳庙作为维系日常生活的盘踞点，废庙改祠对他们来说实是利益攸关。虽然在先前的综合评估中，勘测人员认为解决接收是“无甚问题”^②，但具体落实却并非一帆风顺。

接收的首要难点便是遭遇奉祀以关羽、岳飞为主要的传统文化的抵制。关羽和岳飞为历代所崇奉的英雄，民国初年，袁世凯曾于 1915 年颁布实行春秋二祭和国庆大阅的关岳庙祭礼，规定庙宇大殿正位左为关羽右为岳飞，两序则分列历代忠武将士，京师和地方还有用于拜祭的关岳庙乐谱。^③ 国民政府时期，奉祭关岳的祀典仍被延续。在政府官方的推导演绎下，关岳祀典逐渐被符号化并成为国家控制场域下“忠义”军魂之神灵象征。^④ 此外，在国民政府颁布的忠烈祠祀相关法令中，亦有“各县设立忠烈祠如必须就公共庙宇改建时，应事先商得该庙宇负责或当地佛教会之同意”^⑤ 的明文规定。因此当国民政府以褒扬抗战忠烈的名义改建关岳庙时，关岳二圣本身所兼有的传统忠烈形象便与国民政府所力图塑造的现代忠烈形象产生冲突，关岳祀典的规制也成为各方抵制的有力凭借。

1942 年 8 月，重庆市民发动了全市请愿的“上书运动”，恳求保留关岳庙。在请愿者看来，关岳二公是崇德报功中的民族英雄，为民众所景仰，而关岳庙则是维系民族精神的寄托物；相反，现时之改祀抗战将士则不过“纯为慰藉诸烈士在天之灵启”。^⑥ 长期盘踞在关岳庙附近的商团亦反对废庙兴祠，茶社代表刘至安等更是提出三条变通的理由，认为关岳二神以其忠义为历代相沿奉祀，如果一旦废弃而改为忠烈祠，将“使后代无从景仰”；刘氏等人并以首都忠烈祠筹建计划中关岳二圣移居后殿一款发难，认为以现时之忠烈居正而以前代之忠烈退后的做法，是“新鬼大”而“故鬼小”，是“不啻追崇现代之忠烈而反屑续前代之忠烈”的表现。^⑦

几乎与此同时，重庆市道教会亦加入捍卫关岳庙的行列中。在道教人员看来，关岳庙对国家民族是“亘古裡祀未坠”，关岳二圣更是“万流景仰”，如若要树抗战楷模，关岳二人实为“民

① 戈茅：《烈士塔》，《新华日报》（重庆）1942 年 6 月 5 日，第 4 版；《太行浩气传千古 左权将军公葬》，《解放日报》1942 年 10 月 17 日，第 1 版；《中共北方局等规定“七一”至“七七”为宣传周》，《解放日报》1943 年 6 月 25 日，第 1 版。

② 《建设首都忠烈祠计划》，1942 年。

③ 参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中华民国法令大全补编》第 13 类，“礼制服章”，商务印书馆，1917 年。

④ 参见田海林、李俊领：《“忠义”符号：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关岳祀典》，《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1 期。

⑤ 《行政院函国民政府文官处为据内政部呈报历次阵亡残废受伤革命军人特别优恤办法内关于本县设立忠烈祠办法第二条补救意见请鉴核一案应准照办》，1936 年 7 月 8 日，国民政府档案 001—012049—00018—003，台北“国史馆”藏。

⑥ 参见《建设首都忠烈祠计划》，1942 年。

⑦ 参见《建设首都忠烈祠计划》，1942 年。

族之先声”。^①同年9月，江北县道教会和巴县道教会等发起四川道教联合会运动，以声援重庆市道教会的吁请，保庙运动达到高潮。在联合运动请愿者看来，抗战忠勇固然“尚志”，以慰后烈虽为“可钦”，但是先烈之忠肝义胆不但“名标青史”且还为后生之楷模，因而关岳二圣“尤宜可敬”；联合运动还以历届政府保存关岳庙的法令举措为依据，认为改建关岳庙是“大有违者”，而此风一开则“何庙尚存”。^②

接收关岳庙的另一困难，还表现为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的纠葛。1942年7月，盘踞在关岳庙内的重庆市财政局第二税捐稽征所首先发难，认为其现有所址偏僻占地面积小，对忠烈祠的改建毫无障碍，而搬迁则面临损失重大的困境；重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亦以警务重要、无空隙地修建公私房舍等为由拒绝迁让。与此同时，重庆市政府在致函内政部的呈文中也以“两所业务重要自难停顿，且关岳庙附近实无公私房舍可资租用”^③为由，恳请免于迁让。

关岳庙是不少道众的栖身之所，废庙兴祠无疑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存，因而道教会也反对将庙宇改为祠堂。1942年8月，重庆市道教会会长张圆江从维系生计的角度出发上呈重庆市政府，认为庙内道众四十余人有老弱病残，且在战时修葺关岳庙后已积欠外债达万元之巨，如若被改建为首都忠烈祠，则众人生活“危如累卵”^④。而对以关岳庙作为营生据点的商人来说，改庙为祠无疑会使他们的生计备受打击，因此拒迁或缓迁成为他们最初的态度。在道教会上呈的同时，关岳庙附近的茶社和天然橘汁厂也纷纷以利益受损、开支费用上涨和生活难以为继相诉，恳请政府予以补偿；消费合作社则认为搬迁后所觅工地需纠工建筑而急不可能，于是请求宽延时日。^⑤

相较于道教会、商人团体以生计为由的措辞，重庆市巴县则以拥有关岳庙产权和维护其辐射范围内的权益为主要说辞，以此来维护自身的利益。1942年9月，巴县县长王式典上呈内政部，认为关岳庙前所有铺面系由该县前教育局所移交的学产，而其租金收入又均已列入预算，所以也呈请保留关岳庙以维学产；与前述群体的诉求相区别，王氏还请求将庙址改建后的全部地权仍定案为该县所有。不过，在王式典看来，最好的选择仍是在原忠烈祠旧址或其他优越地址上改建首都忠烈祠。^⑥

面对各方不同程度的抵制，内政部不得不再次强调首都忠烈祠为中外观瞻的重要性质和崇祀忠烈作为国家大典的深刻意义，并据此对关岳庙附近团体下达了最后迁移期限的通牒。^⑦然而督饬的结果并非尽如人意，接收人员依旧遭遇各方不同程度的敷衍与抵制。即使建设首都忠烈祠筹备处在随后召开的筹备会议上，再次作出敦促庙内机关住户“如限迁出，不再展延”^⑧的决议，成效仍十分有限。据奉令催迁的相关人员呈报，到1942年8月下旬，各方搬迁的情形如下：

竹林茶社、廉快照相馆两家，结定八月二十日迁离，事实尚在观望；桂花镇消费合作社，结词狡猾，仍旧卖茶；铸魂学社结定二十五日，洽催又欲延期；大同学会，是否能于二

① 参见《建筑首都忠烈祠附件》，1942—1946年，内政部档案129—412—1，台北“国史馆”藏。

② 《建设首都忠烈祠计划》，1942年。

③ 《建筑首都忠烈祠附件》，1942—1946年。

④ 《建设首都忠烈祠计划》，1942年。

⑤ 参见《建设首都忠烈祠计划》，1942年。

⑥ 参见《建筑首都忠烈祠附件》，1942—1946年。

⑦ 参见《建设首都忠烈祠计划》，1942年。

⑧ 《建筑首都忠烈祠附件》，1942—1946年。

十五日迁出，像是尚得商量；甜食业公会天然鲜橘汁厂，结定八月三十一日迁出，似亦难于凭信；二十三集团军留守处门尚锁置，该处职员仍在寄宿，深夜始归，佛晓即出；二十八集团军留守处虽已迁走，但其驻所又为桂花镇派出所及警察所占。①

各方的敷衍与迁延，其直接原因显然是与各自利益受损有关，但也与政府在催迁过程中政策的失位不无关联。面对群情激愤的困局，蒋介石最终不得不指令在重庆市内复兴关处择址修建，但问题同样突出。复兴关形势虽雄伟，基地虽宽广，但也具有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和工程量大的劣势②，再加之物价上涨较快，修建所需经费巨大，首都忠烈祠的筹建面临重大挑战。兹将不同阶段筹建首都忠烈祠经费统计如下，见表1：

表1 建设首都忠烈祠不同阶段所需建筑经费表

时间	最初计划（1941年）	关岳庙改建（1942年）	复兴关修建（1943年）
款额（元）	6万5千	52万4千	600万
备注	1943年费用包括工程费、设备购买费和办公费		

资料来源：《建设首都忠烈祠计划》，1941—1946年，行政院档案014—010602—0037，台北“国史馆”藏；《内政部核示建立首都忠烈祠的有关文书》，1943年1—4月，内政部档案一二（6）-1734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由表1可以看到，时段不同，建设首都忠烈祠所需经费也不同，且随着时间的推后呈急剧上升的趋势，这与战争所导致的大后方物价上涨密切相关。面对此种现状，国民政府虽做出“先用五十万元经费建筑正殿，其余缓建”③的决定，但具体工作仍一筹莫展。到1944年，国民政府不得不下令缓建。尔后行政院在1945年4月又重提筹建的计划，但依然苦于经费的捉襟见肘而告罢。随着抗战的即将胜利，行政院最终决定将陪都忠烈祠与重庆市忠烈祠合并筹建，以作陪都抗战纪念物，而首都忠烈祠则俟还都后“另行筹议”④。至此，战时首都忠烈祠的筹建计划落下帷幕。

三 无行的象征：首都忠烈祠与国家抗战记忆的形塑

首都忠烈祠虽未修竣完成，但在战时却发挥着无形的作用。在1940年颁布的《抗敌殉难忠烈官民祠祀及建立纪念碑坊办法大纲》中，曾规定“入祀首都忠烈祠者并得同时入祀各省市县忠烈祠”⑤，这使首都忠烈祠得以外化成一种无形的象征，通过创造出一种超越籍贯的“民族共有英雄”形象，使各地忠烈祠祀突破地域局限，从而形成地方抗战记忆与国家抗战记忆交相辉映的局面。

① 《修建首都忠烈祠》，1943—1945年，内政部档案129—414，台北“国史馆”藏。

② 《内政部核示建立首都忠烈祠的有关文书》，1943年1—4月，内政部档案一二（6）-1734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内政部核示建立首都忠烈祠的有关文书》，1943年1—4月。

④ 《建筑首都忠烈祠附件》，1942—1946年。

⑤ 《广东省政府关于增设抗日忠烈祠及建立纪念碑坊的文书》，1943—1947年，广东省政府档案2—2—0099，广东省档案馆藏。

在忠烈祠祀办法的规设下,各地忠烈祠所奉忠烈或祭祀对象主要以有功于当地的烈士为主,崇奉的主体,除抗战烈士外,还供祀有古代或革命先烈。如福建省部分县市忠烈祠即入祀有明朝时期当地的抗倭烈士^①,云南省则在忠烈祠内举行纪念拥护共和阵亡的云南籍革命烈士^②,而甘肃省宁青县更是将该县革命先烈李兼亭的诞辰作为忠烈祠落成暨烈士入祠之日,希借此勉励地方人士“继承李公遗志努力前进”^③。据此不难看出,在国民政府的忠烈祠祀模式下,对于基层来说,忠烈祠所凝聚的记忆始终是一种地方记忆。这种情形,在首都忠烈祠祠祀体系的影响下很快就有了改观。

1940年7月,也即张自忠将军牺牲后的次月,行政院通过了将张氏入祀忠烈祠以让社会各界“瞻庙貌而仰忠勤”^④的提案。次年12月,国民政府又发布入祀忠烈祠的令,要求各地将张自忠、郝梦麟等殉难将领一体入祀首都忠烈祠并同时入祀全国各省市县忠烈祠,借以“彰崇德报功之盛,益励同仇敌愆之风”^⑤。具体入祀人名见表2:

表2 国民政府1942年公布入祀首都忠烈祠并祀全国各省市县忠烈祠名单

姓名	职衔或身份	姓名	职衔或身份
张自忠	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戴安澜	陆军第二百师师长
郝梦麟	陆军第九军军长	王凤山	暂编第四十五师师长
冯安邦	陆军第四十二军军长	樊 钊	陆军第七十一师师长
陈安宝	陆军第二十九军军长	王克敬	陆军第四十二师师长
唐淮源	陆军第三军军长	寸性奇	第二十师师长
武士敏	陆军第九十八军军长	夏国章	陆军第十七师副师长
李守维	陆军第八十九军军长	赖传湘	陆军第十九师副师长
佟麟阁	陆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	庞汉楨	陆军第一七三旅旅长
郑作民	陆军第二军副军长	秦 霖	陆军第一七一师旅长
朱鸿勋	陆军第五十三军副军长	郑廷珍	独立第五旅旅长
赵登禹	陆军第一三二师师长	姜玉贞	陆军第六十六师旅长
刘家麒	陆军第五十四师师长	赵锡章	陆军第七十师旅长
饶国华	陆军第一四五师师长	谢晋元	陆军第八十八师团长

① 参见石有纪修、张琴纂:民国《莆田县志》第18卷,“建设志”,民国钞本;《嘉善建忠烈祠》《新闻报》1937年7月7日,第9版;《专署飭县查报抗倭先烈史迹俾送入忠烈祠供》,《福建日报》1941年9月23日,第2版。

② 参见《云南起义滇各界举行纪念》,《解放日报》1942年12月27日,第2版。

③ 《忠烈祠落成 水楚老主持典礼》,《甘肃民国日报》1948年3月5日,第3版

④ 《张自忠将军入祀忠烈祠业经政院会议通过》,《浙民公报》1940年7月8日,第1版。

⑤ 《抗战殉职民族英豪一体入祀忠烈祠 国府着由政院转飭遵办》,《前线日报》1943年1月1日,第3版。

(续表)

姓名	职衔或身份	姓名	职衔或身份
王铭章	陆军第一二二师师长	刘震东	第五战区二路游击司令
刘桂五	骑兵第六师师长	朱世勤	晋西游击司令
方叔洪	陆军第一二四师师长	马玉仁	军委会参议第一路游击司令
钟毅	陆军第一七三师师长	唐聚五	东北游击司令
石作衡	陆军第七十师师长	李翰卿	陆军第五师指挥官
王竣	新编第二十七师师长	卢斌	鲁东行辕主任

资料来源：《国民政府明令抗敌殉难将领张自忠等三十八员入祀首都忠烈祠并同时入祀全国各省市县忠烈祠》，1942年12月31日，国民政府档案001—036130—00001—002，台北“国史馆”藏

张自忠等国民党将领因抗战时期的忠勇殉国而闻名于世，早在郝梦麟等将领牺牲之际，社会上就盛行着赞誉其忠烈精神的舆论，认为他们为保卫国土而殉职沙场的表现是“足以动天地而醒国魂”，并认为正是这种忠烈精神才使“国脉得以延续”。^①因此将这些著名抗战将领入祀首都忠烈祠并从祀全国各省市县忠烈祠，无疑更有助于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在此过程中，国民政府所精心建构的忠烈符号也能通过共有的民族英雄而得以逐层级、多方位扩散乃至强化。如1942年改建的道真县忠烈祠，除奉祀本县籍烈士外，还供祀张自忠等38位将领，并定每年举行公祭一次^②；广东省在1943年奉祀张自忠等国家烈士的县份更是达到29县局。^③足见首都忠烈祠祀体系对地方忠烈祠祀所产生的影响。

这里再以西安革命忠烈祠为案例略作探讨。西安革命忠烈祠的修建开始于1943年，其祠址系1927年开辟革命公园时建造的烈士祠，祠内原供祀陕西“革命历次战役阵亡战士”牌位一个。在国民政府推行普建忠烈祠后，陕西省当局便加快了改建的步伐。该祠原拟入祀烈士主要为陕籍革命烈士，但在国民政府公布入祀首都忠烈祠的38位将领名单后，当局立即进行调整，变动前后入祠烈士分别见表3和表4：

表3 西安革命忠烈祠1943年初拟入祀陕籍烈士一览

姓名	所任职务或身份	姓名	所任职务或身份
井勿幕	辛亥同盟会陕西支部长	王鸿遇	护国殉难烈士
钱鼎	秦陇复汉军副大统领	方象堃	护国殉难烈士
郭希仁	秦陇复汉军总参赞	张乐成	护国殉难烈士

① 《郝军长等忠烈殉国感言》，《工商日报》（西安）1937年10月19日，第3版。

② 涂忠鉴：《道真忠烈祠》，中国人民政协会议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文史资料研究会编：《道真文史资料》第1辑，1987年，第110页。

③ 《广东省忠烈祠案》，1946年3月，内政部档案129—390，台北“国史馆”藏。

(续表)

姓名	所任职务或身份	姓名	所任职务或身份
续桐溪	辛亥革命时任忻代、宁公团团长	张仲良	护国殉难烈士
朱光照	革命师儒	耿直	护法军陕西民军总司令
王兆离	革命先觉	刘顺天	护法军陕西民军副总司令
邹炳炎	辛亥首义烈士	张养诚	陕西靖国军殉难烈士
宋元恺	辛亥首义陕西外交司司长	董威	陕西靖国军殉难烈士
樊毓秀	辛亥首义烈士	于鸣皋	靖国军殉难烈士
吴希真	革命先觉	薛其昌	靖国军殉难烈士
曹树勋	秦陇复汉军敢死军统领	南兆丰	靖国军殉难烈士
柏惠民	革命先觉	李福荫	靖国军殉难烈士
彭世安	辛亥首义烈士	杨瑞亭	为党殉职烈士
陈同	辛亥首义烈士	惠师温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驻陕总司令 政治部部长
万炳南	秦陇复汉军副大总统	杨天仁	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
马开臣	辛亥首义烈士	王珏	陕西靖国军第7路司令
韦伯明	辛亥烈士	郭英夫	陕西靖国军第7路副司令
胡景翼	国民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总司令	甄士仁	西北民军总司令
刘守中	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	唐嗣桐	殉职烈士
岳维峻	陆军上将	王俊	抗战牺牲烈士

资料来源：田荣等主编：《老西安旧闻》，陕西旅游出版社，2012年，第165页

表4 西安革命忠烈祠1943年调整后最终入祀烈士一览

姓名	职衔或身份	籍贯	姓名	职衔或身份	籍贯
张自忠	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山东	戴安澜	陆军第二百师师长	安徽
郝梦麟	陆军第九军军长	河北	王凤山	暂编第四十五师师长	山西
冯安邦	陆军第四十二军军长	山东	樊钊	陆军第七十一师师长	不详
陈安宝	陆军第二十九军军长	浙江	王克敬	陆军第四十二师师长	不详
唐淮源	陆军第三军军长	云南	寸性奇	第二十师师长	云南
武士敏	陆军第九十八军军长	察哈尔	夏国章	陆军第十七师副师长	广西
李守维	陆军第八十九军军长	江苏	赖传湘	陆军第十九师副师长	江西

(续表)

姓名	职衔或身份	籍贯	姓名	职衔或身份	籍贯
佟麟阁	陆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	河北	庞汉桢	陆军第一七三旅旅长	广西
郑作民	陆军第二军副军长	湖南	秦霖	陆军第一七一师旅长	广西
朱鸿勋	陆军第五十三军副军长	吉林	郑廷珍	独立第五旅旅长	河南
赵登禹	陆军第一三二师师长	山东	姜玉贞	陆军第六十六师旅长	山东
刘家麒	陆军第五十四师师长	湖北	赵锡章	陆军第七十师旅长	河北
饶国华	陆军第一四五师师长	四川	谢晋元	陆军第八十八师团长	广东
王铭章	陆军第一二二师师长	四川	刘震东	第五战区二路游击司令	山东
刘桂五	骑兵第六师师长	热河	朱世勤	晋西游击司令	山东
方叔洪	陆军第一二四师师长	山东	马玉仁	军委会参议第一路游击司令	江苏
钟毅	陆军第一七三师师长	广西	唐聚五	东北游击司令	吉林
石作衡	陆军第七十师师长	山西	李翰卿	陆军第五师指挥官	山东
王竣	新编第二十七师师长	陕西	卢斌	鲁东行辕主任	
井勿幕	辛亥同盟会陕西支部长	陕西	王鸿遇	护国殉难烈士	陕西
钱鼎	秦陇复汉军副大统领	陕西	方象瑩	护国殉难烈士	陕西
郭希仁	秦陇复汉军总参赞	陕西	张乐成	护国殉难烈士	陕西
朱光照	革命师儒	陕西	耿直	护法军陕西民军总司令	陕西
王兆离	革命先觉	陕西	刘顺天	护法军陕西民军副总司令	陕西
邹炳炎	辛亥首义烈士	陕西	张养诚	陕西靖国军殉难烈士	陕西
宋元恺	辛亥首义陕西外交司司长	陕西	董威	陕西靖国军殉难烈士	陕西
樊毓秀	辛亥首义烈士	陕西	于鸣皋	靖国军殉难烈士	陕西
吴希真	革命先觉	陕西	薛其昌	靖国军殉难烈士	陕西
曹树勋	秦陇复汉军敢死军统领	陕西	南兆丰	靖国军殉难烈士	陕西
柏惠民	革命先觉	陕西	李福荫	靖国军殉难烈士	陕西
彭世安	辛亥首义烈士	陕西	杨瑞亭	殉职烈士	陕西
陈同	辛亥首义烈士	陕西	惠师温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驻陕 总司令政治部部长	陕西
万炳南	秦陇复汉军副大总统	陕西	杨天仁	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	陕西
马开臣	辛亥首义烈士	陕西	王珏	陕西靖国军第7路司令	陕西

(续表)

姓名	职衔或身份	籍贯	姓名	职衔或身份	籍贯
韦伯明	辛亥烈士	陕西	郭英夫	陕西靖国军第7路副司令	陕西
胡景翼	国民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总司令	陕西	甄士仁	西北民军总司令	陕西
备注	由于王克敬并未阵亡，西安革命忠烈祠于1943年5月不得不奉命将其牌位去掉，故而总牌位实际只有73个				

资料来源：《国民政府明令抗敌殉难将领张自忠等三十八员入祀首都忠烈祠并同时入祀全国各省市县忠烈祠》，1942年12月31日，国民政府档案001—036130—00001—002，台北“国史馆”藏；田荣等主编：《老西安旧闻》，第165—167页

此外，在具体牌位设置上，陕西省除在中间设定一名为“革命忠烈之位”的总牌位外，两侧还分上下两排、一左一右按照非陕籍和陕籍安置两个牌位。^①可以看到，在最初的筹建规划中，当局更强调忠烈祠的地方记忆功能，入祀对象全是陕籍烈士且以革命烈士为主；而首都忠烈祠祀的运作，则突破了这种地域局限，通过创造出一种超越籍贯的民族共有英雄形象，使陕西的地方记忆与国家记忆相融合，国民政府所建构的忠烈符号在此过程中得以传播与强化。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情状在其他省份也得到执行并一直延续到战后。

结 语

抗战时期的忠烈祠无疑是国民政府重构国家忠烈记忆的政治文化尝试，在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忠烈祠的筹建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国民政府均有着重要意义。对于个人来说，忠烈祠为个人展现自身价值、实现人生意义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即使曾经“掩蔽”一时，只要战时立德立功，亦可“千秋万世不朽”^②；而于国民政府言，通过昭忠表烈、弘扬忠烈精神，不仅能唤起和培养社会民众的民族意识，实现抗战的精神动员，还可以在宣传和动员中强化自身的政治合法性，以应对来自日本和汪伪政权的威胁。

在国民政府四级忠烈祠祀模式的范导下，首都忠烈祠扮演着统摄各级忠烈祠的总领角色，在国际方面也肩负着为中外观瞻的重要意义。在战事日益激烈、物价上涨迅猛和经费不敷的现实环境中，首都忠烈祠的筹建计划虽经不断变更，但具体工程举步维艰，尤其是选址上的艰难抉择和厘不清的多重纠纷，反映了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国民政府所推行的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以及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不过，尽管首都忠烈祠建筑本身并未完竣，但其所形成的祠祀文化却外化成一种无形的象征，通过创造出一种超越籍贯的民族共有英雄形象，使国民政府所建构的忠烈符号得以向各层级、多方位扩散，在此过程中，地方所建构的忠烈记忆也逐渐从单纯的地方性中脱离开来，抗战的集体记忆缘此被强化。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本文责编：周 全

^① 参见田荣等主编：《老西安旧闻》，陕西旅游出版社，2012年，第167页。

^② 大风：《百花洲畔忠烈祠》，《力报》1947年6月18日，第2版。